

梁稳根： 根在中华，矢志民族工业振兴



■ 本报记者 蒋皓

梁稳根是湖南三一集团的创始人。作为民营企业阵营的一匹黑马，去年，他曾雄踞胡润·《福布斯》排行榜双榜首，成就了一段闻名遐迩的财富传奇。今年，党的十八大代表名单上梁稳根的名字又赫然在列，“商而优则仕”的各种励志版本让这个崇尚时代诞生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风华正茂的梁稳根在大学毕业纪念册上写下过“人类因梦想伟大”的青涩诗句，“种植一块中华民族工业的试验田，打造世界级企业”就是

他最执著的梦想。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湖南人创业精神被梁稳根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今，梦想破茧而出、蜕化成蝶——三一已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工程机械制造商。2011年7月，三一重工以215.84亿美元的市值入围全球500强，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机械企业。

一次创业， 打破恐惧技术创新

创业会经历风雨，立业也不会一帆风顺。

1983年，梁稳根毕业后顺利地分配到位于七星街镇的国营企业洪源机械厂。在群山起伏深处的这家企业是为数不多的文明灯火。当时社会正处于第二轮改革的发初期，各种思潮正在涌动。新来的大学生梁稳根显示了异于常人的魄力，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毅然辞去了铁饭碗，怀抱做中国经济试验田的理想开始了艰苦创业。

1986年，他们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6万元人民币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在一个地下室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业报国之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梁稳根回到母校请恩师翟

登科教授来现场指导。1989年，厂里收入突破1000万元。1993年，梁稳根将企业更名为“三一集团”，并将总部搬到了湖南省会长沙。

1994年，梁稳根注意到重工制造领域的无限商机，毅然冲入这个国企独大的领域。技术是一个致命的短板。梁稳根深刻地认识到，“与其引进技术跟在国外亦步亦趋，沦为‘生产车间’，不如另辟蹊径。”于是，三一没有走以低价格获取市场的“轻基因”之路，而是走了一条自主研发、不靠价格战获得竞争力的“重基因”之路。很快，三一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专利——集流阀。靠这种不畏权威、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三一攻克了一个个看似遥不可及的难关，产值超亿元。这一年是梁稳根创业史上的奠基之年。从1993年到2003年，三一用10年时间跃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前列。

技术创新成为三一实现不断超越的第一生命元素。

2007年，三一研制的66米泵车创造了最长臂架泵车吉尼斯世界纪录，两年后，72米泵车刷新了这一纪录。2011年，86米泵车又问世了，中国人一次次站到了世界泵车制造领域的最前沿，从技术的“跟随者”发展成

“引领者”。“挑战自己的高度，才能改变世界的高度。”梁稳根自豪地说。

2008年，“神州第一挖”的SY2000C大型液压挖掘机在三一诞生了。2010年，千吨级起重机SAC12000诞生了，打破了500吨级以上超大吨位起重机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2011年，三一SCC8600TM(3600吨)履带起重机又诞生了，被誉为“全球第一吊”。

从国内外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到重大国际救援，皆可看见三一的身影——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欧洲第一高楼莫斯科联邦大厦、日本第一高楼阿倍野中心大厦、三峡工程、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俄罗斯最大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英国伦敦奥运场馆。尤其是三一对福岛核电站和智利矿难的救援为“中国制造”赢得世界尊敬。

二次创业， 重振资本市场雄风

2003年，集团核心企业三一重工上市。2005年，三一重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93.44%的高赞成率顺利通过，标志着中国股权分置改革成功打响第一枪。（下转第三版）

中国企业走进新时代

（上接第一版）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确定了“国家所有、分级代表”、“权力、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监管新体制。

随着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企业户数从196家减少到117家。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掀起兼并重组浪潮，拥有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增加了话语权。

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的香港新机场、世界最高钢筋混凝土建筑俄罗斯联邦大厦等一批高难度、标志性建筑“作品”上，镌刻着中国企业的名字：中交集团、中冶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2年世界500强中，我国内地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达到了43家，其中不乏处于完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如中国建材、中远集团、中国五矿、中国建筑等。

2000年10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原生产部的78家军需企业与军队脱钩，重组成立新兴际华集团，由此，新兴际华毅然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新兴际华集团董事长刘明忠告诉记者，集团重组成立时，成员企业亏损面达到60%，但2011年的营业收入达到1476亿元，实现利润36亿元。“以营业收入计算，我们相当于再造了22个新兴际华！”

10年艰辛的探索改革，10年不懈的攻坚创新。肩负着发展重任，承载着民族梦想，国有经济创造出新的辉煌，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

十年， 我们坚持改革、走向市场

从2002年到2011年，国有企业以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6%、利润年均增长22%和税金年均增长17.9%的速度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十年间国有企业之所以能稳定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努力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兼容。

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经营机制改革……改革，为国有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998年至2000年，政府声势浩大地对国有企业实施“推动改革攻坚与三年脱困计划”。三年扭亏期间，国家支付大量资金救助国有企业，共核销银行呆坏账1261亿元，实施债转股4050亿元，剥离国有企业不良资产13000亿元。同时通过让307家国有企业优先上市筹集资金2723亿元，在国内外上市国有企业22家，筹集资金267亿美元。另外，国家还因为贴息安置下岗职工也支付了大量资金。有专家估计，国企脱困国家投入的救助资金不下30000亿元。但是，“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吃完股市吃土地”的政府救赎，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时举动。这一时期的国企改革可谓两条腿走路。

2005年10月，宝钢集团依照《公

司法》改造为规范的国有独资公司，同时组建了新的董事会。到2007年底，150多家中央国有大型企业只有19家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2005年，中国铁建成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二批董事会试点单位。2006年11月，董事会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中国铁建的管理体制，实现了公司制的飞跃。这个由铁道兵改建的国有企业寻找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他们毅然做出了抉择：主业整体改制上市。

2008年3月10日、13日，中国铁建A股、H股先后在上海、香港挂牌上市，并在股市大幅震荡下跌时逆势而上取得成功，成为至今最大的IPO项目。主业整体上市的成功，中国铁建在资本市场建立了持续有效的融资平台，实现了由公司制向股份制的飞跃。

“企业地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行政级别决定的。即便是军工企业，也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才能保证企业的生命力。”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张国清说。

《央企经营：宋志平的经营之道》受到世界广泛关注。身为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双料董事长的宋志平，以亲身经历和切身感悟，有力回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的质疑。显然市场经济的理论正在企业落地开花，走向成熟。

10年历程，中国市场体系已经建立，市场规模明显扩大，市场结构趋向合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日益成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

十年， 我们力排争议、改制前行

针对国企改革，国内并不风平浪静。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这场争论。此后，国企改革便在争议中前行：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混合所有制企业收购国有企业、外资收购国有企业等方式纷纷登场，上演国企改革的一场场大戏。2004年下半年，国资委明确表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宜实施管理层收购”。2005年4月，国资委、财政部共同颁布《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中小型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时，需进场竞价，并与其他受让者同股同价。至此，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引起争议最大、争论时间较长的管理层收购终于走到规范的道路上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大中型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形成股权多元化格局。混合所有制以联想控股、张裕集团、云南医药、深圳航空的混合所有制为代表，在此后的国企改革中比较普遍采用。但是，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则是另一番景象：米塔尔钢铁公司并购华菱管线公司、柯达公司收购乐凯公司国有股，都曾引发激烈争

论。美国凯雷收购中国徐工更是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安全大讨论”。而社会舆论对外资并购的巨大关注，也最终影响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政策。但是，新景象又出现了，中外私募基金收购国有企业近两年粉墨登场。2007年，美国高盛集团收购河南双汇集团。联想控股公司旗下的弘毅投资公司前两年并购了江苏先声药业公司等企业，2007年收购了河北省石药集团。

回顾中国国企改革历程，国有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到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确实一半是泪水一半是喜悦；转化经营机制、合资上市一度被称为搞活国企的灵丹妙药，但实践证明，没有产权基础的改革终究是沙滩大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企业集团等手段也曾被寄予厚望，但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国企经营机制转换，没有实现国企与市场经济的真正接轨。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企业改制终于成为中国几代人艰辛求索后的正确抉择。

十年， 我们科学发展、转型升级

一个企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往往来自于深切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来自于对未来的清醒判断与准确把握。中国的企业被迫面临着一次大转型。

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火烧温州鞋的暴力事件，数百名西班牙鞋匠冲进运货码头，将价值100万美元的16个装满了温州皮鞋的集装箱付之一炬。事实上，过去两年有超过2.5亿双中国鞋进入意大利，鞋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这对于一个以制鞋业为骄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事后欧盟为了安抚当地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个“非中国制造”的标志。

代工曾是“中国方式”的标志，富士康的十三跳宣告了这种“深圳模式”的衰败。这种依赖“人口红利”的发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应对挑战，科学发展成为指导我们的精神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危机中捕‘机’，化‘危’为‘机’，大危机刺激政策将促内需与调结构、惠民相结合，4万亿投资重点锁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与民生相关的领域。此后，陆续制定并实施了汽车、钢铁、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以期在保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发展后劲。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国黄金集团乌鲁鲁吐山矿区鲜花绚烂，杨树展绿。从2005年项目开工至今，环保投入已累计达到4亿元，复垦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绿化面积超过87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超过95%……

“乌山项目的环保投入超过了总投入的15%，但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必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孙兆学说。

在新加坡，中国建筑研究院收

购过去的新加坡国家建筑设计研究院。“我们不能在资源上称雄，要在科技创新上上台阶。”中国建筑设计院院长修龙说。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仅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就实现节能4900万吨标准煤，是国家下达节能考核目标的1.8倍；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36.1%，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7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36.3%，降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

十年， 我们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10年前，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罗门美邦曾预言，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前五年，中国将会出现4000万人失业，国内企业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10年过去了，当中国汽车企业吉利收购了瑞典汽车巨头沃尔沃，当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制造厂商把生意做到了五大洲，昔日的预言已成笑谈。这个“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难以置信的“中国奇迹”，让社会主义制度活力焕发。

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入发展快车道，到了关键路口。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化进入快速成长期。这些阶段性特征，给一个基础薄弱、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当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国企改革红利渐渐耗尽，正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爬坡的“中国号”列车，不进则退。

有学者评论，中国走向大企业时代，不是一次被动和应景式的策略性选择，而是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生的又一次历史性大转折和跨越，其意义与已出现过的1949年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1978年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两次转折有着更深刻的内涵。中国已经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中国正在世界市场上配置资源。

每一次企业状态的变迁，都是要解决时代的问题。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面对“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的特殊国情，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导引一场持久深刻的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发展模式转变，转向大企业时代，转向做大做强做优，向世界一流目标前进，这是一场多么壮观的历史潮流。

过去十年是中国深入参与世界格局调整、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走向的1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从未如此急切，中国企业正在成为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十年， 我们鼓励民企、国民共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的原则，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建设者。

2005年2月25日，新中国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政府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发布。新华社全文播发当天，引起市场强烈反响。内地、香港股市反应十分热烈，内地民企概念股份纷纷大幅上升。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在重申十六大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创业解决就业”、“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至此，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框架。随后的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等都是对这个框架的完善。

然而吉林通钢事件，将新阶段劳资冲突暴力化倾向推向悲剧。围绕建龙集团并购、撤销再并购通钢所引发的的是非非，引发了各界关于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经济和道德的重重追问。

在争议中发芽，在非议中顽强成长，在莫衷一是中异军突起，最终在执政党的正式文件和决定中正名，在宪法中落脚，中国的民营经济，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汗湿重衣。请看：10多年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从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看，民营经济已是担纲的主角之一。

当然，理性客观的统计数据，难以取代公众的主观感受。在一些公众的主观感受中，民营企业往往便与投机钻营、为富不仁、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温州跑路事件与吴英案一次次引起巨大舆论。

2012年，各部委又密集推出落实国务院文件、推动民间投资的工作细则，以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十年， 我们解放思想、更新血液

企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三代企业家仍然活跃在新世纪。三代企业家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成长方面是起着不同作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企业在制造业、商业方面有所建树，尽管他们视野不宽，仍然活跃。第二代海官员为主的企业家在房地产、金融领域驰骋。第三代企业家不乏海归派搞高科技、互联网大显身手。每代企业家所从事的产业，代表了那个时代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

每个事件都曾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校正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宋志平、宁高宁、傅成玉这些央企的管家人，张瑞敏、谢企华、柳传志，这些国企改革中的获胜者；任正非、马云、牛根生，这些民企的风云人物，杨培新(杨承包)、董辅初、厉以宁、吴敬敏、陈光(陈卖

光)，这些国企的推动者；褚时健、赵新先，这些国企改制的“落马者”，甚至郎咸平、茅于軾，这些国企改革唱反调者。时至今日，这些人都在国企改革的风口浪尖上雕塑般屹立。无论成功与失败，这些人都是我国国企改革历史舞台的“亮相者”，为人们所记忆。

十年的企业改革内容太庞杂、太丰富。而企业改革历程并没有多少诗情画意，并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滑雪般疾速，每一小步的前进都似在5500米的珠峰大本营，每迈一步都要喘着长长的粗气。一位专家说，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艰难最具颠覆性的部分，始终伴随着思想的争论与实际利益的羁绊博弈。而在这些博弈中，新一代企业家叱咤风云，展示他们的智慧，他们无疑是历史的推动者。

在企业改革进程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与改革者初衷相悖的社会问题，例如：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的问题，垄断行业有可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生产过剩与企业间倾轧问题，中小企业贷款难与高利贷问题，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企业空心化问题。

不管有多大问题，多么难走的路，有一点是要明确的。到每一个城市，人们都几乎用同一个结论告诉你，变化最大的是这几年。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若隔世。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生长的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宽，街道上的青石被撬掉弃，上面建起了高大的楼房和商铺，青石板、雨廊、飞檐、河埠头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青春导演贾樟柯拍摄电影《三峡好人》时，拍摄地点是本着2000年历史的重庆奉节县。但他发现，5个月的电影拍摄竟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等他短期回一趟北京再回到现场，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这种感觉便是人们对10年的记忆。

时间是标注前进步伐的刻度。10年，一个国家能向未来走出多远？有的人也许会会说，这十年自己没有做什么事，可是这十年的变化确实比中国几十年、几百年的变化还要大。

变革中熔铸辉煌，平易中彰显成就。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13亿中国人民，走过非同寻常的10年，创造铭于丹青的光荣历史，写下举世瞩目的恢宏篇章，也带领中国企业走进大企业的新时代。

10年转型，形成中国理念；10年改革，写下中国探索；10年挑战，塑造中国精神；10年崛起，做出中国贡献；10年奋进，铸就中国品格；10年的开拓，走进大企业新时代……在现代化事业波澜壮阔的伟大进军中，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不断展开新的内容，中国时代不断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每个重要时间节点背后，都蕴藏着一段大历史。它不仅连接过去与未来，也将现在标注成意味深长的瞬间。我们将走向新的10年，我们将铭记过去的10年。因为我们从这里一起走过10年，我们还将一起走过更加有希望的下一个10年。